十六世纪两类士大夫的代表：文人王世贞与相臣张居正

孙卫国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 王世贞与张居正是十六世纪最为重要的两位士大夫代表。作为文人领袖的王世贞, 入仕之初就积极参与文人社团的活动, 中年以后成为文人群体的领袖, 由于他时常褒贬时政, 因而成了被打击压制的对象, 仕途坎坷, 成为当时“反智论”者的牺牲品。他的人生经历虽对其治史产生影响, 但他评论史实终究还是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 故能在明史研究上作出杰出的成就, 成为明代最为重要的史学家。而张居正初入仕途就为“储相”的庶吉士, 后一直任职于翰林院, 最终成为强权首辅, 而他所走的正是大学士阶层几乎相同的道路。尽管他生前荣耀, 死后却相当凄惨, 注定也是个悲剧人物。他们二人正是嘉、万时期文人与权臣的代表, 而他们命运的坎坷也正是当时文人与权臣命运的缩影。

关键词: 王世贞; 张居正; 文人; 相臣; 反智论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十六世纪中国历史上名臣辈出, 有两个人物尤为重要, 可以说他们是两类不同士大夫的代表, 一位是精于治道、善申韩之术的张居正(1525-1582), 另一位是风流潇洒、独主文坛二十余年的文坛宗主王世贞(1526-1590)。张居正长王世贞一岁, 二人乃同榜进士, 同入官场, 命运却完全不同, 张居正虽有过度归隐的岁月, 但仕途一生得意, 长袖善舞, 终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强权首辅、帝王之师。王世贞才高八斗, 仕途却几度坎坷。在入仕后的四十余年间, 隐居闲置岁月竟达二十余年。在张居正如日中天、大权独揽的柄政岁月中, 作为同榜进士的王世贞竟然再次被迫辞官家居, 心灰意冷的王世贞只得潜心学道, 二人命运不可同日而语。张居正生前辉煌, 死后却被抄家清算, 家破人亡, 子孙零落。作为史家的王世贞又操笔记录他所知道的张居正。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 关系十分微妙, 影响他们关系与命运的内外因素如何? 与其时代和个性是否有关? 张居正生前荣耀, 身后凄凉, 以“国史”自任的王世贞是如何评价他的? 是否夹杂着个人恩怨? 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或许有些模模糊糊的认识, 学术界亦有些似是而非的看法,¹ 但似乎还无人真正说得清、道得明。笔者不揣浅陋, 以他们的关系与交往为主体, 借用海内外有关理论, 对相关问题作些探讨, 以就教于学术界先正同仁。

一、时代、家世与入仕之初

张居正是明嘉、万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家, 王世贞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文人, 地位都相当重要。生活在同一时代, 却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王世贞为世代簪缨家庭出身, 乃世家子弟, 张居正则出身贫寒, 父亲只不过是位不第秀才。两人幼年都表现突出, 有“神童”之称, 成年以后却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既与其家世、个性有关, 更是时代所造成的。

王世贞, 字符美, 号凤洲, 又号弇州山人, 南直隶苏州府太仓人, 出身名门。王世贞祖父王倬(1447-1521)为仕于成化、弘治和正德三朝, 最后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父亲王

¹ 就笔者的孤陋寡闻, 学术界对于王世贞和张居正的专题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在进行他们单个人的研究时, 偶尔会涉猎他们的关系与交往, 但都只限于表面, 亦有断章取义者。故此很有必要系统、深入、全面地探讨他们的交往、命运的特点以及背后的时代, 王世贞与张居正属于两类不同的士大夫, 他们的命运正可谓同一代人的缩影, 也就是十六世纪文人与相臣命运的缩影, 无论文人还是相臣, 他们的结局都是一场悲剧。

忬（1507-1560），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庚戌之变（1550）以通州防虏功，获世宗信任，后累建边功。王世贞自称其家世：“世世贵显……皇祖考讳倬，历官至南都少司马，以政术行宜为弘治、正德间名臣，赐祭予葬。皇考讳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历督抚蓟辽诸军，更六大镇，为嘉靖名臣。”²可见王世贞是颇以自己出身名门而自豪的。

幼年的王世贞被称为神童。十五岁受《易》于骆行简，骆氏与王世贞父王忬同举于嘉靖十年（1531）乡试。王世贞十六岁作《宝刀歌》，有“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之句，骆氏认为他日后定会以文章而名世。嘉靖二十二年（1543），王世贞中应天乡试，为举人，时年十七岁。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正如韦庆远先生指出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隶属军籍的不第秀才家庭”，³其远祖是朱元璋同乡，为凤阳定远人，追随朱元璋起兵，洪武初年为归州府守御千户，定居湖北荆州。出身原本不高贵，到张居正祖辈、父辈，就相当贫穷。把科举考试作为摆脱贫穷的手段，其父张文明虽弱冠即为秀才，被送入书院读书，但在连续七次乡试失败后，最终也只是个穷秀才。所以张居正入仕以后，毫不讳言家世贫贱，常言自己“非闾闾衣冠之族，乏金张左右之容”。⁴出身贫寒的张居正年幼时表现非凡，号为神童，遂成为光大张家门庭的希望。张居正自言道：“弟家世贫贱，为童子时遇先刑部尚书东桥顾公，其抚楚时拔正于毁齿之时，称为神童。”⁵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考中乡试，为举人，巡抚顾璘赠以玉带勉之。出身贫寒的张居正，少年得志，为其以后的人生之路开了个好头。

张居正与王世贞家世的差别显而易见。张居正为首辅以后，在给王世贞的信函中还提到过，所谓：“仆先世单寒，非闾闾衣冠之旧。老父不揣，妄干名笔，是何等人地，而辱王、谢大家之垂盼乎？”⁶尽管这可以说是张居正的谦逊与客套，但也确属事实。王世贞与张居正都少年得志，一举即中乡试，但接着考进士都失败了，两人首次皆进士落第。嘉靖二十六年丁未（1547），王世贞与张居正再次参加会试，此次双双成功，遂为同榜进士。当时李春芳为状元，张居正为二甲第九名，王世贞为二甲第八十名，一同中榜的还有杨继盛、汪道昆等人，既有同榜之谊，也注定他们的命运将纠葛在一起。

明代是个极端专制的王朝，十六世纪的明朝专制政体发展到极至，不仅政治上专制，而且文化上亦极端专制。⁷任何人都无法逃脱这样的时代，而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人，只有适应这样的时代，才能使人生之路顺利些。尽管进士及第，王世贞看重的不是乌纱帽，反而是珍视作为文人的身份，常常与诸新科进士诗赋唱和，聚会结社，臧否时政。张居正则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绝不参与文人的活动，在一个极端专制而“反智”氛围相当浓厚的时代里，⁸张

²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四库全书》第128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一百四十《亡弟中顺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状》，第47-48页。有关王世贞先祖世系，详见姜公韬：《王弇州的生平与著述》（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第39种，1974年），第30页；郑利华：《王世贞年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页。

³ 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⁴ 张居正：《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三十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第445页。

⁵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与南学院吴初泉书》，第439页。

⁶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其八》，第443页。

⁷ 李焯然：《明中叶的反传统思潮——吴中四才子与明代文人的自我追求》，见黄俊杰、町田三郎主编《东亚文化的探索：传统文化的发展》（台北：正中书局，1996），第543-554页。

⁸ 余英时认为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反智论”具体可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这种态度的人可以称之为“反智性论者”；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出一种轻鄙以至敌视，这就是“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余英时特别指出，中国反智论有两个重要来源，第一是政治方面，历史上打天下而创业垂统的人往往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废物，汉高祖、明太祖最为典型；二是所谓道德，特别是政治化的道德，变成了有位者必有德。参见余英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社，1976年），第1-46页《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余英时：《史学与传统》（台北：

居正比王世贞更易适应这样的时代，所以他在仕途上走得要顺利得多，而作为文人的王世贞则相当坎坷。

王世贞举进士后，却不谒馆试，因为“耻从柄臣道地”。⁹ 当时其父王忬即告诫他：“士重始进，即名位当自致，毋濡迹权路。”¹⁰ 王世贞牢记父亲教诲，入仕以后，对权贵始终敬而远之，对文人社团却极为热心，王世贞重视作为文人的身份，而作为文人重视自我的追求与个人价值身份的肯定，这种肯定不是官场的职位，而是在文人社团中的地位。¹¹ 而这种社团是游离在当时政治之外的。初入仕途的王世贞不是谋求高官厚职，而是充分发挥文人的本色，广交天下文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贞以进士隶大理院，次年为刑部郎，即参加京师王宗沐等人组织的诗社。不久，授刑部主事。嘉靖二十八年（1549），与李攀龙订交，从此诗文唱和无虚日，王世贞诗文皆好，在文人社团中声名鹊起。陈继儒称之“以刑曹郎与李于麟诸子曰相唱和，名夺公卿间”。¹² 《明史》称：“世贞好为诗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唱和，绍述何、李，名益日盛。”¹³ 在文人社团中，诸新科进士意气风发，毫不掩饰，“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¹⁴ 年轻气盛，既觉得当时无人，亦不以权贵为意，自然也就容易得罪他们。而王世贞更相当自负，随着文坛上声名日盛，士人间互相激宕，有议论之曰：“都下士人聚而叹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亦自负，强项如故，而性不能曲事贵人，往往肮脏守法。”¹⁵ 可见，一开始，王世贞就是热心文人社团活动，对于权贵决不肯曲意侍奉，在不仅政治上专制而文化上也专制的明代，注定王世贞仕途的坎坷与不平。王世贞言道：

然余往者则已有一时名，既名日以削，而宦日以薄，守尚书郎满九岁仅得迁为按察，治青齐兵，此其意将困余以所不习故。於乎！即令余未见嫉，司命削其官，与田父、猎徒角寸阴于南山之下，又不可而使之御魑魅、咏山鬼亦有以自乐也，乌在其为困哉！¹⁶

因为文人的秉性，不事权贵的风范，以文人而自负，因而引起权贵嫉恨，使得他仕途上陷于困境，无法施展才干，王世贞也就只得自我解嘲了。

同王世贞比，张居正就幸运得多了。张居正进士及第虽未入一甲，在二甲中则是佼佼者，中进士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只有科举拔尖的人才能入选庶吉士，而庶吉士是作为未来阁部大臣的人选，时人目之为“储相”，奠定了相臣的基石。初入仕途，张居正就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有利于升迁的职位。而在对文人社团的活动上，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态度完全不同，他毫不感兴趣。进士及第以后，尽管他也是新科进士，但他对大多数新科进士的赋诗结社、藏否时政一类的活动，不屑一顾。王世贞在论及张居正这段时间的表现时，如是说：“是时为嘉靖之丁未、戊申间，诸进士多谈诗为古文，以西京、开元相砥砺，而居正独夷然不屑也，与人多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切者。”¹⁷ 张居正不与王世贞等一般文人一样只求风花

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第109-124页《从“反智论”谈起》。

⁹ 陈继儒：《眉公杂著·见闻录》（台北：伟文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清代禁毁书丛刊》第一辑，1977年）卷五《王元美先生墓志铭》，第228页。

¹⁰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清代禁毁书丛刊》第一辑，1976年）卷九十八《先考思质府君行状》，第4596页。

¹¹ 郑利华：《明代中叶吴中文人集团及其文化特征》，《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4月）第4卷2期，第99-103页。

¹² 陈继儒：《眉公杂著·见闻录》卷五《王元美先生墓志铭》，第228页。

¹³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第7379页。

¹⁴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李攀龙传》，第7378页。

¹⁵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李攀龙传》，第7378页。

¹⁶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一《王氏金虎集》，第3417-3418页。

¹⁷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传》，第373-374页。

雪月、饮酒作诗，反而是日日思索处理政事、治理国家的良策。张居正为庶吉士时，“日讲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¹⁸而且他在为人上很有城府，作为同榜进士的王世贞对此看得很清楚，“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沈深有城府，莫能测也。”¹⁹张居正的个性使得他能处理好各种关系，而且入仕之初，就得到权臣徐阶等重视。徐阶见张居正“沈毅渊重”，“独深相期许，曰：‘张君，他日即荐臣重国矣’”²⁰所以有意照顾。既见赏于当朝权臣，又不过分参与朝中党争，虽不得重用，但张居正已深深地朝中扎根了，也为张居正仕途的升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尽管当时他刚入仕途，但已志在公辅，故对“户口、扼塞、山川形势、人民强弱，一一列”，十分留心，²¹每日在翰林院读此类书，为以后之治国行政打下基础。在他成为强权首辅后，曾与友人描述翰林院读书情形，乃“以耿耿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有为，而欲籍一技以自显庸于世”，²²来形容自己在翰林院读书日子的情形。任庶吉士及随后的翰林院编修的日子里，张居正一边读书，一边构想着治国理政的良策，因此当机会来临之时，张居正早已做好了准备。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为翰林院编修，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张居正都一直只是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十年未迁，其间嘉靖三十三年（1554）到三十六年（1557），他还归老家闲居数年，仕途一度灰暗，但他并不泄气，只是在等待时机而已。

王世贞似乎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志向，他更看重作为文人与史家的身份，所以，即便入仕以后，更多地与文人结社，诗赋唱和。而他平生之志在于作一部纪传体“国史”，所谓：“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访问朝家典故与阅阅琬琰之详，盖三十年一日矣。”²³王世贞以后多次有所表示，在《国史策》中言：“愚故欲效法司马氏，……有能删节其凡例，自羲皇而下迨于今为一家之言，以藏之名山大川，愚且愿为之执鞭，而终其身也。”²⁴在给诸友人函中亦提及这种志向，如言：“仆生平不自量，妄意欲整齐一代史事，以窃附于古作者之后。”²⁵“方仆盛壮时，……欲整齐其事与辞。勒成二家，以追迹盲腐，……而二百余年来无一人受兰台之管者，乃上称金匱，下衷稗官。”²⁶无论是吟诗作文，还是修史以传之后世、藏之名山，都是文人的志向，所以王世贞志向更多地是希望成为一流的文人与一流的史家。

尽管与张居正为同榜进士，志向不同，志趣亦异，但生活在当时的时代里，作为一位有功名的读书人，他们又都离不开仕途。作为文人，王世贞试图保持一定的独立性，随着他在文坛的地位日益扩大，更加看重文人的独立性与文人的自由，势必与极端专制的明朝政府与官场发生冲突，而他所代表的是士人与文人的群体，在明末极端专制的时期内，始终是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张居正则一开始就加入明中叶以后的宦官核心阶层之幕僚集团，后由翰林院而入内阁，始终是作为“相臣”而成长的，并逐渐成为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所以入仕之初就显示了不同的特性，而以后二人间的纠葛与矛盾正是宦官与文人团体之间斗争的缩影。

因之，作为文人的王世贞看重的是文人的本色与自我的追求，作为相臣的张居正初入仕途就潜心于安邦治国之学问，虽然为同榜进士，同朝为官，但起点有所不同，也预示着他们仕途命运的差异。

二、不同的仕途命运：累遭挫折的王世贞与一生顺适的张居正

¹⁸ 《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张居正传》，第5643页。

¹⁹ 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传》，第374页；《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张居正传》，第5643页。

²⁰ 《张太岳集》卷四十七附录张敬修等《太师张文忠公行实》，第584页。

²¹ 《明经世文编》卷十四林潞《救时之相论》，第87页。

²² 《张太岳集》卷十五《翰林院读书说》，第185页。

²³ 《弇州山人续稿》卷五十四《弇山堂别集小序》，第716页。

²⁴ 《明经世文编》卷三百三十五《王弇州文集·国史策》，第3599页。

²⁵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书牍·徐儒东》，第708页。

²⁶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二《徐生》，第604-605页。

王世贞与张居正虽然同朝为官，但因为属于两类不同的人，最初他们似乎并没有多少交往，即便有过往来，也绝对说不上密切。嘉靖中期，正是严嵩权倾天下之际，王世贞与张居正仕途似乎都不太顺利。张居正虽然为翰林院编修十年不迁，其间一度心灰意冷，回乡养疾，但终究能沈住气，静心养望，不忤逆权臣。王世贞为郎官九年不动，却有满腹怨言，之后虽迁为青州兵备使，但牢骚满腹，干脆公开与严嵩作对，终于得罪严嵩，父死家败，王世贞只得辞官家居，仕途跌入谷底。而在文坛上声名大振，与李攀龙为文坛宗主。文坛上的声名不仅未给王世贞仕途带来幸运，反而可以说是致祸的根源。

王世贞为刑部主事时，有位阎姓犯人藏在当时权贵锦衣卫陆炳家，王世贞竟从陆炳家把他抓走，陆炳求权臣首辅严嵩说情，王世贞竟不予理睬。最初严嵩有见于王世贞的才气，亦有意笼络他，王世贞不仅不领情，反而故意讥讽。王锡爵言：“时分宜相当国，雅重公才名，数令具酒食征逐，微论相指，欲阴收公门下，公意不善也。”²⁷ 而文人间的唱和，颇令严嵩顾忌，王世贞自言道：“吟咏时流布人间，或称七子，或八子。吾曹实未尝相标榜也，而分宜氏当国，自谓得旁采风雅权，谗者间之，眈眈虎视，俱不免矣。”²⁸ 所谓“旁采风雅权”，正是“反智”的一种重要表现，严嵩是权臣首辅，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既然不为严嵩所用，严嵩就想方设法惩处他，多年后王世贞回忆这段时期的遭遇，写道：

嘉靖中余守尚书郎九岁不迁，当自劾罢。客有过者，谓贵人申申而詈：子非吴中小儿耶？奈何阔武膺视，不置长安睫间也。而多使酒骂坐，抵掌谈说世事。一二年翦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罢。客谓：吾子敖士也。余愧谢无有。因忆曩者不自怪，间从历下小妇索苦满引，实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畏热，伏时从曹中还，以急谢谒刺，不善捉发，晨恒令家人捉之，以故蓬解不受栉，腰腹小肥，磬折差碍耳。即使酒骂坐，与世龌龊争长，岂真能为傲者。²⁹

由此可见王世贞生性有一种傲气，所谓“使酒骂坐”、“谈说世事”，正是士人历来的特性，也是最遭当权者忌恨的，故而他一直备受压制。但王世贞并没有从这种事情中吸取教训，他始终与严嵩对着干，而他这种性格正是当政者所难容的，也是“反智”首当其冲的目标。后来同榜进士杨继盛弹劾严嵩十大罪，严嵩不仅未动毫发，反而将杨继盛处以斩刑。杨继盛夫人上疏求救，王世贞亲为润色疏文，临刑前，杨继盛托孤于王世贞，杨继盛问斩以后，王世贞亲自祭奠。“严氏微闻之，意不乐。”严嵩几度“意欲引置公为重，数近而公数远之，终不能笼公。”³⁰ 这样严嵩在等待机会，惩处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大才子”。

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世贞父亲王忬因滦河战事失利，诏逮下狱。王世贞当即辞官，与其弟王世懋日在京师，托门说客，求乞于严嵩及诸权贵。未果，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其父弃世。王世贞扶柩归乡，从此归隐不出。王世贞认为其父被杀乃严嵩落井下石的结果。隆庆元年，王世贞向同榜进士、内阁大学士李春芳进言其父被杀原因时说：

至于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杨继盛）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为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戇，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殓，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亦为所诮。其二，杨某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徐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葶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构老不可解。以故练兵一事，于拟票内一则曰大不如前，一则曰一卒不练，所以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先人

²⁷ 《王文肃公文草》卷六《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

²⁸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艺苑卮言》，第6867页。

²⁹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零一《敖士赞序》，第4751-4752页。

³⁰ 《眉公杂著·见闻录》卷五《王元美先生墓志铭》，第225页。

者深矣。预报贼耗，则曰王某恐吓朝廷，多费军饷。虏贼既退，则曰将士欲战，王某不肯。兹谤既腾，虽使曾参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³¹

王世贞描述了其父得罪严嵩的三件事，所以他认为严嵩是“阴夺先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其实，王世贞在其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严嵩杀其父，以灭其威。王氏父子与严嵩的矛盾，并非只是一家一户的问题，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与历史根源。

对权贵不依附，不逢迎，反而处处唱反调，而对文人则大加笼络。正如前面提到，王世贞入仕后，就热心于文人的社团活动，后来与李攀龙同为天下文坛宗主。李攀龙去世后，王世贞独主文坛二十年。《明史》称：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歿，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³²

天下文人皆奔走于王世贞门下，王世贞对此非常看重，尤重视提携后进，奖掖不遗余力。陈继儒称之：“公之奖护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³³王锡爵亦赞之：“尤好以文字奖掖人，后生初学每得公一言品题，一面倾吐，则或希声射影，传相引重，……以故人皆归心。”³⁴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对后学有循循长者之风，故在文坛有极高的威望。在“反智”高涨而极端专制的明代，文坛领袖注定是被摧残的物件。

张居正尽管与王世贞一样，仕途初期并不太顺利，但张居正并不气馁，更不与权贵抗衡。在嘉靖初年激烈的斗争中，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表现了高超的手腕。在严嵩当政期间，他对时政有清醒的认识，对朝中各种弊病了如指掌，但他深知不能直接与严嵩斗，嘉靖二十八年（1549），为翰林院编修时，张居正当时给嘉靖帝上了一道《论时政疏》，指出国政五大弊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瘵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其它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³⁵针对这五大问题，张居正一一提出解决办法。疏文言辞恳切，而且疏中绝不提严嵩或其它人的名字，对事不对人，也不过分指责明世宗，使得他们从心理上能够接受，这是与杨继盛直接指陈严嵩“十大罪”完全不同的疏文，旨在说理，而不是一种情绪的发挥与释放。尽管疏上去后，未引起明世宗注意，但也没有招来祸害。张居正在翰林院数年间，感觉未能发挥才干，于是从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1554-1559），归隐家乡，读书养望。他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宁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不愿得罪严嵩。归隐数年间，尽管处江湖之远，还是心系庙堂，对时事洞若观火，并有心于朝廷政事，在给友人函中写道：

长安棋局屡变，江湖羽檄旁午，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有奸人乘一旦之衅，则不可胜讳矣。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顾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此可为慨叹也。中怀郁郁，无所发舒，聊为知己一吐，不足为他人道也。³⁶

这里既有对时局的忧虑，又有怀才不遇的郁闷。但表明他即便在归隐岁月中，还是心系朝廷的。嘉靖三十八年（1559），张居正回朝，结束归隐岁月。两年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徐阶为首辅。张居正亦扬眉吐气，在朝中地位日益稳固。徐阶将张居正视为心腹高参。嘉靖去世，徐阶独引时为正五品的翰林侍讲学士张居正草拟《遗诏》，以五品官职参与遗诏，这在明代历史上是个特例，由此可见当时张居正在徐阶心目中的地位。隆庆元年（1567），一年之内，由正五品侍讲学士经礼部、吏部侍郎而超擢为正一品的礼部尚书、武

³¹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三《上太傅李公书》，第5731-5733页。

³² 《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第7381页。

³³ 《眉公杂著·见闻录》卷五《王元美先生墓志铭》，第228页。

³⁴ 《王文肃公文草》卷六《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凤洲王公神道碑》。

³⁵ 《张太岳集》卷十五《论时政疏》，第183页。

³⁶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西夏直指耿楚侗》，第450页。

英殿大学士，从而入阁，这在明代历史上极为罕见。当时内阁中，张居正虽然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惮之，重于他相。”³⁷隆庆元年（1567）以后，张居正进入内阁，为明代权力核心集团成员，万历元年（1573）就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隆庆元年（1567），在张居正飞黄腾达之际，王世贞尚家居，为其父伸冤而到处奔走。当年王世贞给内阁成员上书申诉冤情，包括给徐阶和张居正。王世贞给张居正等人的信函都收录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这封信似乎是王世贞给张居正的第一封信，信中有言：

不肖世贞衅恶深重，致先人罹于大祸，自奉讳来七易寒暑矣，乃心未尝一日不在明公，然未尝敢以尺寸之牍尘记室者，自惟身负不孝之罪，于人无所比数，且不祥姓名，物情所厌，是以次且踟躅于门墙之外而有所未果。乃者，天地鼎革，万类维新，窃不自量，一拟伏阙哀吁，匍匐万里，行次德州，始闻明公爰立之命，不胜雀跃，星驰至国门，而迫于禁例，上谒无由，区区私情，敢托毫素……³⁸

可见，王世贞以隆庆登基之时，为父伸冤，北上德州时，获知张居正入阁，故以同榜之谊请求张居正为其父平反伸冤。此前，他们似乎并没有交往，甚至都没有通过信函。张居正收到这封信作何反应，不得而知，《张太岳集》中并没有收录他的回信。反而是张居正为首辅以后，给王世贞的信都一一收录。估计张居正没有回信，或许是张居正以刚入内阁，不便说情而有所顾虑，未予作答，也未可知。

尽管没有史料说明张居正在朝廷为王世贞父亲平反雪冤的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但隆庆元年（1567）八月，朝廷诏复王忬原官，算是为他平反了。而两个月前，王世贞就获知朝廷要重新起用他。隆庆二年（1568）四月，王世贞被起为河南按察副使，后改为山西提刑按察使。在张居正入阁以后，王世贞仕途也变得柳暗花明了。随着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王世贞与张居正终于又走到一起，相互间的交往也频繁起来，而王世贞后半期的仕途生涯，最终与张居正有着割舍不开的联系。

三、江陵柄政时期的王世贞

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起复，而当时内阁首辅是高拱，高拱对王世贞也有些微词。高拱与王世贞父王忬系同年进士，但高拱并没有因这层关系对王世贞有所照顾，反而亦觉得王世贞不亲附而予以打击。当时起复之际，有任命他为史官的提议。得到徐阶等人赞同，不久，徐阶致仕，此议遂罢。³⁹王世贞与高拱有两件事发生联系：一是隆庆元年王世贞兄弟伏阙讼冤，要求为其父平反昭雪时，徐阶力主复其父冤，但当时高拱同徐阶正争权夺利，“而有恶言”，持不同意见，不主张平反。二则王世贞执掌晋臬后，因其母有病，上疏乞休，当时高拱正为首辅，遂将其乞休疏压下不复，认为这是王世贞对抗自己的策略，且曰：“是将卧而待迁乎？”王世贞只好“强赴晋，卒卒完棘事”。不久其母病再犯而不治，“寻以讷闻，高公知之曰：‘向者之乞休，情乎？’复寝不行。”随之高拱门生御史、给事中纷纷上疏弹劾，“罪我以与杨忠愍周旋而酿先大人祸，蔑我以居先大人丧而纵淫乐。”⁴⁰

事实上，王世贞与高拱发生冲突，是在其第一次复出之后，当时的王世贞虽然已休致十余年，而其文名则正如日中天之时，他是名副其实的士人领袖，其文学活动十分活跃，正操纵着士子舆论，是智识阶层的代表。因为王世贞向来就表现不与当权者亲附，他与高拱的

³⁷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传》，第376-377页。

³⁸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三《上江陵张相公》，第5737-5738页。

³⁹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题辨疏后》称：“若余之起自田里而补魏也，南琐台荐之曰宜使佐治国史也，故相徐公、故宰杨公曰可一而也。于是再疏辞不得，而徐公去国已矣，杨公亦去国矣，余自浙参而掌晋臬也。”第316页。

⁴⁰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题辨疏后》，第7328-7329页。

关系原本非常一般，而又被高拱看成是政敌徐阶的势力，故再次受到压制和打击，成了高拱反智摧残的目标。

张居正对王世贞的情况当然十分了解，但因为他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在给王世贞的信函中劝他暂时忍耐，而且对王世贞受到排挤不公平的待遇，深表同情。隆庆五年（1570）初，其时王世贞因母丧正在家服丧守制，张居正给王世贞函中言：

才人见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议之兴，良亦繇此，公论在人，其可泯乎？仆虽不肖，窃敢自附于祁奚之谊，乃汪伯玉遂以告公，若将有移德于人者，非仆本指也。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韬之，其精乃全。公读礼之余，阖扉养重，亦天所以韬其光而厚其蓄也，愿公自重，毋忽。⁴¹

此函可见，张居正对王世贞的才气固然十分欣赏，而对王世贞的秉性与脾气亦了如指掌，他深知王世贞仕途失意的根源，因为作为文人的王世贞好意气用事，故劝慰王世贞家居之时应该韬光养晦，别意气用事，以免再度受挫。隆庆六年（1571），张居正再次致函王世贞，如此劝慰他：

迭辱华翰，深荷雅情。惟丈俊才卓行，冠冕人伦，沈抑数年，輿情共惜，然不困厄乌能有激乎？清明之世，与天下贤士褒然汇征，纾先世之积愤，展平生之所怀，在此时矣，幸努力自爱。辱惠佳书，宝若彝鼎，兼之珍币，岂所敢当。⁴²

函中可见，王世贞给张居正写过多封信，还赠送了礼物。而张居正非常赏识王世贞的才华，而且勉励他“纾先世之积愤，展平生之所怀，在此时矣”，表明张居正要重用王世贞，但同时告诫他“努力自爱”。

隆庆去世，万历登基。朝中政权亦发生变化，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协助下，驱逐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大权在握，张居正开始人事安排与部署，而王世贞也是在他的安排之中。万历元年（1573）正月，王世贞服除，二月，被授予湖广按察使。湖广是张居正的家乡，把王世贞安排在湖广，可以说既是对王世贞的考验，也是对他一种笼络。说是考验，因为湖广远离京师，王世贞并不熟悉，张居正可以试探王世贞的反应。而且王世贞在其母去世前，为山西提刑按察使，现在起复为湖广按察使，也是符合朝廷惯例的。而安排在自己的家乡，自然也体现张居正对王世贞的信任。但王世贞得知这一消息，颇为不快。其有诗言：

晋楚吾何择？山公意不轻。虎须惊往路，鸡肋叹浮名。病入园林癖，衰钟儿女情。家乡事事好，物态一堪评。⁴³

王世贞生平之志是兰台令史，可能希望任职于翰林院，但却授职于偏远的湖广，自然很不高兴，迟迟不肯动身。张居正很快就闻知王世贞的心思，当即给他去信，解释任命的缘由，并催促他上路：

今岁当宾兴，楚人闻见甚陋，诚愿得公大雅之作，以为程序。幸遄发征麾，趣赴盛会。惟公以鸿渐之仪，困于燕雀，兹当圣作之隆，众贤汇进。铭太常、勒燕然，皆所优为者，外台执宪，直暂借耳。使旋，草草附复。⁴⁴

⁴¹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二》，第442页。对于这封信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有所论及。书中言：“例如王世贞，是本朝数一数二的散文大家，又和张居正同年，得中进士，按理说应该情谊深厚，然而情形却不是这样。王世贞一心想做尚书，多次主动向张居正表示亲近，替他的父母作寿序，又赠送了许多礼物，包括一件极为名贵的古人法书。但是张居正却无动于衷，反而写信给王世贞，说什么‘才人见忌，自古已然，春首浮议之兴，良亦繇此，公论在人，其可泯乎？仆虽不肖，窃敢自附于祁奚之谊，乃汪伯玉遂以告公，若将有移德于人者，非仆本指也。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韬之，其精乃全。’前两句恭维，其后则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看待，只能摆在盒子里让人赞赏他雕铸之美，却不能用以斩将夺旗。”（第65页）黄老的解释并不正确，因为他没有考虑此信所写的时间，这封信写于隆庆五年，而所谓给张居正父母写寿序尚未发生，不应将万历年间发生的事情放在隆庆年间说。

⁴²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一》，第442页。

⁴³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十九《闻补楚宪之命四首》其二，第1686页。

⁴⁴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三》，第442页。

张居正之所以把王世贞任命为湖广按察使，希望他能主持湖广乡试，而且说明湖广之职，只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不要意气用事。接到张居正的信函，王世贞没办法，只得于六月起程。王世贞在给友人函中直把内心的不得已表达出来，称：“弟此行殊不得已，苦当路聊萧之不置，且无辞以对耳。六月触暑就途，公私追钱，十日内遂无顷刻休。”⁴⁵ 王世贞闷头上任，一开始就表现文人那种意气用事的禀性，预示着随后的坎坷。

其实，张居正最初是真心想重用王世贞，在催促王世贞上路的同时，张居正也给湖广巡抚写信，推荐王世贞为湖广乡试作程文，“新任王廉宪凤洲，娴于文词，委以程试之作，必能代劳，有裨盛典。”⁴⁶ 八月，王世贞履任，监湖广乡试，作《湖广策问》，其中有《国史策》，王世贞在其中表达了想登兰台，为令史的梦想。王世贞借乡试策问的机会，向张居正表明了自己的意愿，同时也间接示意不乐为地方官的心态。

王世贞入楚不久，张居正又给王世贞去函，既详细解释湖广之任的原因，又表明不日将把王世贞迁为京官。信中称：

缴凭人至，知道从已至楚，入锁院，主文衡。今岁程序，必将为海内冠矣。以下国之荒陋，何幸得闻云和之声，睹环玮之宝哉？宪长例当入觐。汪伯玉言，公雅不乐行。且循资、量移、晋右辖，旦夕便可为内转之阶，仓卒不及为公择地，但借资耳，诸惟原亮。⁴⁷

此信写于万历元年（1573）九月，向王世贞解释湖广之任，不过是“循资”而已，不日即可升为京官。湖广按察使为正三品，九月即升为从二品的广西右布政使，万历二年（1574）二月，王世贞转任太仆寺卿（从三品），九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抚郟阳（正三品）。在一年时间内，王世贞的职位竟升迁了三次。虽然品级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由地方上的正三品一年内转为京官正三品，实际上就是如张居正信函中所言乃“循资”而已。京官正三品以后，就很容易升迁为尚书和内阁大学士了。可见，对于王世贞的任职，张居正是颇费了些心思，而将王世贞任命为郟阳巡抚，这对王世贞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而张居正将王世贞安排在此职位上，亦颇费了一番脑子。

郟阳府乃设在湖广的荆襄地区，郟阳地区自明初以来，就一直是流民的聚居地，这里山深地广，山林深阻，流民往往群聚其中。谷应泰形容这里是：“郟阳斗绝，西北错处陕、蜀，南下则光、信、南阳、豫州之域，汉北楚山又皆蜿蜒互属，下抵凤阳、庐、霍，地遍千里，壤接数省，河流四达，复岭万重，糜罗之故国，鬻熊之边陲也。”⁴⁸ 成化年间，先后发生刘通、李原领导的流民起义，明朝先后派白圭、项忠率重兵镇压，成化十二年（1476），即设置湖广郟阳府，并设置湖广行都司，“抚治八郡”，“割地三省，设置六县，而郟阳巍然重镇矣。”⁴⁹ 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而当时依然是流民聚居之所。

张居正的家乡江陵为荆州府，与郟阳府同属湖广行都司管辖。张居正对家乡的情况非常了解，认为治理“非随俗救弊”，不得有所为也。⁵⁰ 一年之内再次任命王世贞为其家乡的官职，实际上既是一种笼络，又是一种考验。而离开京师，远离文人聚会的场所，或许对王世贞的仕途会有点好处，至少不会经常与诸文人聚会藏否时政，而引起当权者的不满。在王世贞上任不久，张居正又致函给他，言：“前令弟送公河上书，其中所言，具见经济宏猷，一一领悉。承差至，知道从已入楚视事，无任欣慰。”⁵¹ 可见，任命王世贞为郟阳巡抚，张居正相当满意。

⁴⁵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寄陆与绳》，第5627-5628页。

⁴⁶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附答楚按舒念庭》，第442页。

⁴⁷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四·为楚宪长时》，第442页。

⁴⁸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卷三十八《平郟阳盗》，第568页。

⁴⁹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郟阳盗》，第568-569页。

⁵⁰ 《张太岳集》卷九《荆州府题名记》，第122页。

⁵¹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五·自太仆卿转郟院时》，第442页。

这期间王世贞显然给张居正写过多封信，但并未收入王世贞的文集中，或许是因为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为免牵连，故加销毁了。但张居正给王世贞的信都得以保存，从张居正的回信中看出，王世贞甚至将一些治国行事的奏章都给张居正，相互间的关系应该相当密切。张居正既与王世贞有同榜之谊，而当时王世贞又是文坛宗主，诗文为天下所效法，故张居正乐意用之。对于张居正笼络人才，明人就有评之曰：“江陵当国，号能用人，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或推毂至通显。”⁵²可见，张居正柄政之初，是尽量援引人才，并尽其所能的。王世贞与张居正既有同榜之谊，王世贞又是当时文坛宗主，声名颇盛，张居正焉有不用之理！但张居正作为强权首辅，他也是有条件 and 限度的。他对王世贞苦心安排在自己的家乡，或许张居正有所寄望，希望得到回报。对于一般礼节上的事情，王世贞还是尽可能令张居正满意。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父年七十，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母年七十，王世贞都作寿序以贺之，对此张居正是心存感激的。甚至为此张居正还特致函王世贞表示感谢：“前老父诞辰，已承伟制，兹老母七袞，复拜雄篇。天孙之锦，后先相映；昭华之宝，璀璨盈庭。珍重感切，诚不能喻之于言也。”⁵³但在政事上，王世贞逐渐令张居正失望了。王世贞为郟阳巡抚期间，或许是因为日子清闲，一方面处理政务，一方面整理文稿。在郟阳巡抚任上，他刻成了《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八十卷。但偏远的山区、闲适的生活并未消磨他那文人的气概，或许是作为文人的迂腐，在郟阳任上，王世贞忤逆张居正，终于令强权首辅张居正弃之不顾，甚至欲去之而后快。

先是，万历三年（1575），江陵有蠲租之诏，知县李应辰派公正张现负责丈勘田亩。三月二十日，府学生许仕彦认为张现对他的田产“报亩逾数”，遂诉陈李知县，李应辰又派巡检范应瑞复勘，但仍发现许隐匿田亩，许仕彦不服，李应辰将其送回学校，并将张现收监。不料次日，许仕彦聚集诸生，“二十余人倡首，数百人和之。”且遍立匿名揭帖，曰：“先翦李知县羽翼，共执范巡检，剥其皮，划其目，歼其毛。巡检去，知县次之。”范巡检以弓兵自守得免，而知县事先得到消息，逃脱。随后几天，闹事生员在路上遇见李知县，要求杖责皂隶、书吏，李知县不准，遂凌辱李知县。李知县不堪忍受，遂向王世贞汇报情况，并提出辞呈。不久，王世贞又接到湖广按察使几乎同样的报告，而且知道闹事生员中，“虽始祸者许仕彦，倡恶者萧九成，而生员王化实为之主，文训导刘璠为之党，助教授曾贵成自监利署印归而为之从舆者也。”王世贞认为“荆州为楚望郡，几于首善之地”，而诸生鼓噪如此，目无法纪，应当重处，且历来“匿名有律，卧碑有禁”，对于闹事生员绝不姑息，主张将许仕彦、王化等人“从重遣发斥革”。⁵⁴这原本只是地方上的一件小事，但是，因为闹事生员中所谓的“实为之主”的王化，是张居正妻弟，所以就没有这样简单了。而王世贞的处理自然也令张居正不快，在张居正看来，两次将王世贞派往自己家乡为官，王世贞竟不知照顾其亲属。现在无法查考王世贞是否知道王化是张居正妻弟，按照以往王世贞行事风格，他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因此，即便王世贞真的知道王化是张居正妻弟，他也会照样处理，而不会委屈照顾的。此次生员事件令张居正已是不快，而随之不久，又发生地震，王世贞在《地震疏》中，竟然直接挑战张居正的权威。

农历万历三年（1575）五月初，湖广均州、襄阳府之枣阳、宜城、南漳、光化、穀城，郟阳、河南南阳府等地相继发生地震，王世贞当即上《地震疏》以陈下情，并借地震论时政，曰：

……窃念臣知识浅易，不能通于天下之微，又不晓习占候风角，第闻之史：李固曰：地阴也，法当安静，今乃越阴之职，故动。《京房传》曰：阴背阳，占为夷羌去。又《易·飞候》曰：震以四月，五谷不熟，人民饥。今者为五月矣，阳盛之极，

⁵² 《国榷》卷七十一，第 4373 页。

⁵³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六·郟院时》，第 442 页。

⁵⁴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零七《恳乞容令休致疏》，第 5028-5037 页。

伏阴萌焉，宜静而动，尤非所宜，即今年岁顺成，夷夏辑，是天下未有灾之形，而皇上修德勤政，大法小廉，又未有灾之实。……伏乞皇上笃承仁爱，益懋敬德，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诚孝可以回天，节惠可以待岁。

55

当时正是张居正大权独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的时候，而经张居正一手提拔的王世贞竟然借地震写出这样的疏文，劝慰神宗“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直指张居正专权，以为是祸国根源。疏文自然为张居正所知，张居正极为不快。凡是权臣对于敌对势力绝不容忍，而对于亲手提拔重用的部下，如此讥讽，自然张居正是决不会罢休的。

其实，在万历三年（1575）二月，生员事件和地震都还未发生，恰逢京察，王世贞自陈不职，且乞休，但未允。张居正还有信函安慰他，道：“辱示数议，俟大疏至，当属所司覆行。前岁遣三司马阅边，惟汪伯玉所注措，强人意耳。乃忌者反用此诬诋之，殊为可讶。今已息喙矣。奉别札云云，昨大察时，并未闻有议者，似不必自生疑虑也。”⁵⁶当时二人还没有公开的矛盾，对于京察事情，张居正亲为解疑，还是把王世贞看作自己人，而加以照顾。而这两件事情以后，情况与前就大不一样了。王世贞既然几度不给张居正面子，报复不久就发生了。对于其间的变故，陈继儒分析得很清楚：

……公益自负，强项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权贵人，往往肮脏守法，故言者多附影凭衅而起。……江陵初欲处公史局，公谢唯唯，江陵以为有心远己也。荆州地震，公引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维不宁。又有哗辱邑令者王生，江陵妇弟也，公论奏不少贷。又贻宗人书：相公侵淫耳目之好，非社稷福。其人泄之江陵，江陵积不能堪，虽稍迁廷尉京兆，以貌示用公，而竟以浮言嗾公去。⁵⁷

陈继儒将二人的关系比较清楚地给予说明了，但也有偏见。其所谓“江陵初欲处公史局，公谢唯唯，江陵以为有心远己也”，缺乏事实根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万历元年（1573），王世贞的复出是张居正一手安排的，从张居正给王世贞的信函中已经得到证实，而王世贞对湖广按察使的职位相当不满，在张居正的催促下，才不得不起程，所谓处之以史局，而王世贞“唯唯”不从，纯粹是陈继儒的想象。如果真任命王世贞为史官，则正是王世贞之愿望，也不会闹出不愿出山的事情了。事实上，在万历三年前，他们书信往来不绝，彼此之间关系相当密切，只是因为随之发生的几件事情使得张居正对王世贞不满，故此双方交恶。王世贞自己亦认识到“臣自郧镇以迂直失权臣指”，所谓的“迂直”正是这两件事情。万历四年（1576）夏王世贞由郧阳督抚得迁南京大理寺卿，从品级上看都是正三品，没有变化，实际上，是张居正不满意王世贞，故此从郧阳将其调开。督抚郧阳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而南京大理寺卿则是个闲职，明显有贬抑之意。随之一系列的厄运就跟随而来，五月，王世贞以“荐举涉滥”被吏部纠察而夺俸。十月，南京刑部都给事中杨节弹劾他“大节已亏”，竟被处以回籍候别用。⁵⁸

在王世贞调往南京前后，张居正仍有信函给王世贞。在下达调令前，张居正在信函中言：“郧台僻处，非展骥之地，而岩廊又无虚席，故暂移留棘，以需次焉。”⁵⁹这封信虽然打着官腔，但还顾及情面，而随后一封信则公开谈及彼此的矛盾与不快。言：

自借郧台，而忌者日以伺公之衅，重之以先朝之事，而令弟解近侍矣。操之以举刺之例，而科疏纠冒滥矣。或云仆有不足于君所，或云公有所怨滞于周南。众口之铄，有自来矣，故横发于南疏，盖亦积渍渐润使然，非独言者之过也。如闻舆人之言，

⁵⁵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零七《地震疏》，第4999-5001页。

⁵⁶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书七·郧院时》，第442-443页。

⁵⁷ 《眉公杂著·见闻录》卷五《王元美先生墓志铭》。

⁵⁸ 《明神宗实录》卷五十五，万历四年十月戊辰。

⁵⁹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书八·大理卿时》，第443页。

此举不中，且复有继者，不得已，暂解见任，以息群喙。旋当复公旧毡，涤雪以雪大异焉。然蔽贤之罪，首当在仆，无所归咎。⁶⁰

这里张居正公开谈及双方的误会，而且对王世贞被贬归家的责任，毫不推卸。事实上，王世贞对被贬内幕比任何人都清楚，在他的文集中亦有相关的史料论及此事：

明年之九月，余以中丞节治郢楚，念母以报上及知己有所见辄言，言有示许者与示闻者，往往慙直不中节，而谗间入矣。前是余与楚棘事，愤伪学之披猖，发策一及之，而其魁方用事，又与余同年，往往阳托善余，而阴造不根伤政府语，使人不可闻。会余量移南廷尉，人谓且见疏，其魁乃授指于南琐，而杨公之疏上矣。寻得旨解职候别用。故相徐公时里居，谓余曰：且辩乎？余曰：不难辩也，今犹鸡肋我，辩之是求用也。⁶¹

王世贞在这里的描述有情绪化的成分，并非全部是事实，不过其提及“知己”，似乎暗指张居正，也可见最初二人关系之密切。而所谓“愤伪学之披猖”，应指惩处生员之事件，但是说“其魁方用事，又与余同年”，显然是张居正，把张居正作为他们的头目，则与历史不合，而所谓“往往阳托善余，而阴造不根伤政府语”，亦是王世贞的想象。在万历三年前，张居正对他还是照顾有加的。而杨节上疏则出自张居正的旨意，自然没错。王世贞最后认识到张居正是“鸡肋”他，则算是明智的觉醒。

因为王世贞始终也脱不了文人的秉性，在为隰阳巡抚时，自言：“余生有士安之癖，不能一日释书。”⁶² 虽然受到张居正的重用，而他依然想保持自己作为文人的独立性与议论时政的自由，所以几乎是想到就说，而不顾及是否合适。谈迁称赞他“夙负名节”，⁶³ 可见，他看重作为文人的“名节”，不愿为了侍奉权贵而亏了名节，这既是他作为文人的秉性，又是失意于官场的原因。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向自己挑战，而当时张居正大权在握，权威不容挑战，故此对王世贞就失去了耐心。其实在第九封信中，看出张居正对辞退王世贞还是有所顾忌的，所谓“蔽贤之罪，首当在仆，无所归咎”，既是一种敢作敢当的表白，同时也反应出他内心的失望与无奈。作为当时文坛领袖，又是自己的同榜进士，而张居正竟不能用，当然有“蔽贤之罪”了。实际上张居正的做法正是专制时代下，“反智”的正常表现，不在乎“智识阶层”才干如何，只要忤逆当权者，就会成为排挤和迫害的物件。

王世贞家居期间，显然与张居正还保持书信往来。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卒，为张居正是否应该丁忧，朝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攻击者大有人在。谈迁所谓：“江陵负盖世之才，中道宅忧，墨衰从变，物情大骇，诸君子攻之，或纾或峻，并罹重谴。”⁶⁴ 王世贞并未借此攻击，反而遣使吊唁，张居正似乎很感动，给王世贞的回信中说：“今同年中，有孤所援引，见居要路，漠然不一购问者，乃公独用情优渥至此，令人哀感愧死无地矣。”⁶⁵ 张居正回湖北安葬其父回京后，又有信给王世贞。可见，尽管政治上张居正不再重用王世贞，但始终保持同榜之谊，而王世贞也能顾及礼节上的交往。

王世贞闲居时期，亦曾受到推举，但被张居正所阻而不果。万历七年（1579），有人荐举他为应天府尹，任命刚下，弹劾又起。南京给事中王良心、御史王许之在张居正授意下，上疏论劾不贷。王世贞“辩而辞”，“彼许余辞余快也，怒余辩而褫之亦快也。”⁶⁶ 以后在张居正柄政时期王世贞再也未被授过官职，一直到张居正去世以后，万历十一年（1583）科道荐起，两年后补应天府尹，后升南京刑部右侍郎。在张居正权倾天下的岁月中，王世贞只得

⁶⁰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书九》，第443页。

⁶¹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题辨疏后》，第7330-7331页。

⁶²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七《隰阳藏书记》，第3663页。

⁶³ 《国榷》卷七十五，第4643页。

⁶⁴ 《国榷》卷七十，万历十五年十月丁未，第4325页。

⁶⁵ 《张太岳集》卷三十五《答廉宪王凤洲书其十》，第443页。

⁶⁶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六十《题辨疏后》，第7331页。

闲居在家，仕途失意，只得寄情于诗酒，甚至沈迷于学道。

万历七年（1579），王世贞好友王锡爵女王焘贞据说得道成仙，王世贞与王锡爵等日侍左右学法，王世贞当时觉得：“一切忧怒从喜乐生，毁从誉生，失意从得意生。所读书一字不得用，所撰述文字一字无可传。”⁶⁷ 对于尘世万物皆失去兴趣，当时的王世贞“退居县阳观中，屏葷血，断笔砚，与家庭绝”。⁶⁸ 在县阳子升天以后，王世贞又为其作传。当时传文流入京城，有人想借机兴大狱，进谗言于张居正，张居正对此倒不以为然，认为“事渺小且以往，不足道”。⁶⁹ 张居正不用王世贞，只要不妨碍公务，不影射他的权威，张居正也不会抓住不放。本来应该大显身手的时候，却被辞退归家，王世贞从精神上倍受打击，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故而沈迷于道学，既然人世间尽不如意事情，只得沈溺于神仙道学之中去。尽管仕途上失意，而王世贞于文坛的地位则如日中天，无人可比，天下文人唯他马首是瞻。从王世贞与张居正的关系上看出，虽然有交往、有同榜之谊，但决不依附于任何人，表现了一位士人的独立性与自由的追求。

在处理与王世贞的关系上，张居正作为当权首辅，显示了高超的统治术。在他为首辅期间，王世贞仕途的命运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意愿与安排，但他表现了高超的用人术。而张居正善用术，明人就有评价：

（首辅）至江陵而始自为真相，视部如属也。然江陵有术，每往请者必不自言，必使请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阳应之；或其人大齟齬，乃讽鹰鹫击焉。不则，遂攘之为恩。其见擢者，亦竟不知为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才，腹中富有，所品鹭，每在司铎者上。往请者，欲诎之良难，故其柄常若独操者。先时掌选者常告余曰：“隆庆戊辰（二年）、己巳（三年），时盖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决。”余曰：“岂以其势方张乎？”曰：“不然，此公有断而藻鉴明，所论多中的，故每每从之。夫能掌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岂不然哉！”⁷⁰

可见，张居正对于官员的任用等人事权一切皆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初入内阁就已显示了这样的特性，而当他成为独掌海内外一切大权时，那官员的升迁贬抑，只看张居正的意愿了，所以我们说王世贞后半期的仕途生涯为张居正所左右，完全是事实。张居正对于敌对势力的惩处固然是毫不手软，而也不允许游离势力的存在。他“好以己意见责望天下，欲令打成一片，不计异同”，而当时王学兴盛，天下书院讲学事情很盛，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就下令禁毁书院，一直到万历七年（1579）正月正式在全国宣告，“凡先后毁应天等府书院六十四处。”⁷¹ 禁毁书院是摧毁士人随意议论朝政的场所，作为强权首辅，张居正不仅在政治权利上至高无上，而且要箝制全国舆论，在文化与思想上也实行专制独裁，正是张居正“反智”的集中表现。对于王世贞游离于其势力外，自然他是无法容忍的。而王世贞性格原本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无法摆脱出仕的诱惑，总想方设法争取机会，他可以亲近权贵，保持与权贵的交往；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失去文人的独立性，尤其是他作为天下文坛领袖，更有种树立风范的作用。他不能失去文人的独立性，不能屈膝侍奉、俯首帖耳，时常保持着议论时政的习惯，而这是当权者所忌讳而难以容忍的，所以无论是严嵩、高拱，还是有同榜之谊的张居正，都无法容忍王世贞，这也是他仕途坎坷的内在根源。

因此，从王世贞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极端专制的时代里，也就是极端“反智”的时代里，作为“智性”代表的士人和文人，注定只能是一种受支配的力量，处于被控制的地位，无法获得独立的个性，而追求自由的空间，往往会带来人生的坎坷。这也是王世贞命运坎坷的内在根源。

⁶⁷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八十三《答曹子真》，第625页。

⁶⁸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卷二十三《娄江四王》，第594页。

⁶⁹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第453页。

⁷⁰ 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二十五，孙矿《吏部尚书陈有年行状》。

⁷¹ 夏燮：《明通鉴》卷六十七，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四、王世贞与《嘉靖以来首辅传·张居正传》

张居正生前荣耀无人可敌，死后命运悲惨亦出人意料。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去世，不三月就开始了清算行动，在明神宗帝的授意下，张居正生前政敌纷纷攻击他，张居正生的光环一点点地剥离，最终到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发布诏书，公布张居正的罪状：“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钳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本当剖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伊属居易、嗣修、顺、书都永戍烟瘴。”⁷² 张居正家被抄，家属子孙皆被充军戍边，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自缢身亡。当时整个朝廷皆以抨击张居正为能事。所谓“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⁷³ 在封建专制时代里，即便象张居正这样的权臣也不过是皇帝的走卒，随时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

张居正去世以后，王世贞还活了八年时间，晚年更多地关注明代史书的写作，以完成他平生之志，而《嘉靖以来首辅传》就是其杰出代表，书中张居正就占了两卷篇幅。此书写于清算张居正而“举朝争索其罪”的时代里，王世贞与张居正生前有不少恩怨，又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在王世贞的书中，他又是如何去评价这位昔日亦友亦敌的人物呢？⁷⁴

审视王世贞评价张居正，可以看出王世贞的治史心术，正如清人戴名世谈论史知人方法：“设其事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此论世之说也。吾概论其人之世，又诸作野史者之世，彼其人何人乎？……其为局中者乎？其为局外者乎？……其为有所为而为之者乎？其为无所为而为之者乎？”⁷⁵ 对于张居正传记的写作，王世贞正是“局中者”，从他的分析中看出，他之辨别方式正是如戴名世所说的，不仅“设其事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而且知人论史，论史之先论人。他自己亦有判别的原则，即“舛诞者无我，诬者有我。无我者使人创闻易辨，有我者使人轻入而难格”⁷⁶。“无我”、“有我”即是对著者心术之判断。在研究张居正时候，王世贞是“有我”还是“无我”？⁷⁷

《嘉靖以来首辅传》所涉及的是自杨廷和到申时行共十几位首辅的传记，王世贞是想通过写人物而说明这时期首辅的发展状况，《四库全书总目》对他加以称赞。《总目》论之曰：“世贞作此书，断自嘉靖为始，以明积渐所由来，……于当时国事是非，及贤奸进退之故，序次详悉，颇得史法。……所纪则大体近实，可与正史相参证。”⁷⁸ 可见评价甚高。

对张居正之评价最能看出王世贞的治史心术。论张居正之为政，“大约以尊主权，课吏实，信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⁷⁹ 显然是肯定其效率，言辞之间饱含赞扬之意。对张居正死后，明廷一味追究其罪责，全盘否定其功业的作法，王世贞深表不满，其言：“江陵之忤愆与一时之奉行者诚有之，然不至人人皆奉行，事事皆忤愆也。今有所不合则皆援之正，而有所合则皆斥之邪，仆以为毋论被斥者，即江陵不为冤，亦未尽不冤也。”⁸⁰ 而当时定张居正罪名之一是说他“有异谋”，王世贞对此进行

⁷² 《明神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二，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

⁷³ 《国榷》卷七十二，万历十二年四月丙寅，于慎行《致丘樛书》，第4476页。

⁷⁴ 明清时代，对王世贞史学的评价有褒有贬，贬者如艾南英，批评王世贞着史“以修怨而无君”，认为对严嵩、张居正等人描摹太过，以至于“知有时相而不知有君”。参见周亮工《书影》，卷三，第70页。

⁷⁵ 《戴名世集》卷十四，第404页。

⁷⁶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十一《明野史汇小序》，第3430页。

⁷⁷ 黄仁宇认为王世贞所作的《张居正传》“行间字里，酸辣兼备”（第65页）；“传中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而天性刻薄。而且作者也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第192页）认为他作传就是“以牙还牙”（第65页）。是否真的如此？我们不妨仔细研究一下。

⁷⁸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八《史部传记类》，第524页。

⁷⁹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九，第390页。

⁸⁰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二《与郭中丞》，第8714-8715页。

了严厉的批评，认为：

江陵晚途骄恣贪狠，而宵人又为之翼，而长其伎，罪固当然，有结交紊乱一律可引也，胡至诬之异谋，且堂堂天朝，而主上所师礼之臣至异谋，于国体不少损，元气不少坏耶！六七少年其修怨者，不过快心于一击；干进者，不过求合于一喜，而了无毫发忠君爱国之念。当事之臣，虽极调剂支吾，而太阿倒持，事权旁落，将来貂珣之毒，与缙绅之祸，不知其底止。⁸¹

沈德浮亦引其言曰：“王太仓之评张太岳曰：‘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独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⁸²可见王世贞对张居正的评价还是秉承公正客观的态度，并未因一己之恩怨而随意褒贬。当然以王世贞作为文人的性格，他在评论人物之时总是满含激情，显示出个人好恶，沈德符就指出王世贞“描画两公（严嵩、高拱）妍丑，无不极笔，虽于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业有以自取之。”⁸³认为王世贞虽有好恶，但亦是严嵩、高拱等应得的，并非空穴来风，没有根据。

因为王世贞记述相当客观，史料基本可信，所以清官修《明史》时，非常看重王世贞的史书。对《明史》贡献最大的万斯同坚持以实录为基准，实录不可信，方考以其它野史，家乘，他以为明代野中诸家“无足满人意者，”只有焦竑的《献征录》“可备国史之采择”。⁸⁴但万斯同以为即便实录亦“未可尽信也”，因为《洪武实录》“疏陋已甚，何足征新朝之事实哉”！并以为“君子不观可也”。⁸⁵而“有明之实录未有若弘治之颠倒者也”，⁸⁶故实录不能完全为据，就必须依赖野史家乘，虽然万斯同并没有专门谈到王世贞之史书，但近人揭示出万斯同亦赖王世贞之《弇州史料》，以铺陈正、嘉以前的史实。而他在论明代宗室罪状，征引过王世贞之史书，“凡宗室之罪状，其载于二疏，散见于国史及王元美所纪者，吾不具论。”⁸⁷在这里万斯同明确指出，要考察明代宗室犯罪情况，可依赖实录和王世贞的史书。这是万斯同依从王世贞史书具体例证。但他批评王世贞着史时挟私报复，在《书国史唐应德传后》一文中，以为实录中唐应德传一定出于吴人之手，“大要为王元美所中耳”，因唐应德与王忬被杀有关，万斯同推测王世贞因之怪罪唐，故加贬责。以为：“思质（王忬）之死，何预公事，而乃移怨于公耶？元美且不得仇公而史官代为仇耶？”⁸⁸

王世贞给清人撰修《明史》提供真实可信的史料。而王世贞史书中，传记类占相当大的比重。《嘉靖以来首辅传》、《弇州山人续稿》中的《史传》，及其它的碑传铭文都是很重要的史料，《明史》中有的传就是以王世贞之传记为蓝本，加以删节改编而成。最为典型的的就是《张居正传》。《明史》耗时几十年，历经数稿，以万斯同稿、王鸿绪稿，以及最后的张廷玉稿是最为重要，后者多因袭前者，稍加修改成编。数稿中皆可见王世贞传记的影响。而参与张廷玉《明史》撰修的汪由敦更明确指出王鸿绪《明史稿》中《张居正传》完全是删节王世贞《首辅传·张居正传》而来，他论道：

外间推崇王本太过，遂谓不可增损，今即以行文而论，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稿竟就《史料·首辅传》删节成文，其中描写热闹处皆弇州笔，弇州逞才使气，抑扬轩轻之间，往往过情，平心观之自见，且私书不妨装点，而乃据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⁸⁹

⁸¹ 《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九十三《书牍一石拱辰司马》。

⁸²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评论前辈》，第6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⁸³ 《万历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第209页。

⁸⁴ 万斯同：《万季野先生遗稿》（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第六集第七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第115页《寄范国震书》。

⁸⁵ 《万季野先生遗稿》第142页《读洪武实录》。

⁸⁶ 《万季野先生遗稿》第143页《读弘治实录》。

⁸⁷ 《万季野先生遗稿》第169页《书陆给事凤仪王御史汝止劾胡宗宪二疏后》。

⁸⁸ 《万季野先生遗稿》第166页。

⁸⁹ 汪由敦：《松泉集》卷七《答明史馆某论史事书》。

张居正是明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的传也是明史上极为重要的传，而此传竟只删节王世贞成文而定，笔法亦不变，惹得汪由敦不免批评起来。汪由敦批评的是王鸿绪的《明史稿》，但是笔者将《首辅传》与张廷玉之《明史·张居正传》相对较，发现后者依然未脱《首辅传》之影响。《明史·张居正传》前半部只是对《首辅传》进行了某些删节，绝大部分文字亦未改，全文照录。⁹⁰ 内容上没有任何增加，文字大部分亦是抄自王世贞的《首辅传》。语句、语序、甚至语气皆同，因此，王世贞的《首辅传》正是《明史·张居正传》之蓝本。虽然汪由敦批评了王鸿绪《明史稿》的毛病，但张廷玉之《明史》并没有作什么改变。这实际上是对王世贞所作《张居正传》的一种肯定，正因为王世贞《张居正传》符合历史真实，才为清人所效法和沿袭。

综上所述，王世贞自二十二岁中进士，到六十五岁致仕，在其四十三年宦生涯中，真正任职的只有不足二十二年，只是其宦生涯的一半。而另一半时间则一直闲住，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终其一生，王世贞始终重视作为文人的身份，看重在文人社团中的地位，积极参与文人的活动，中年以后更是当时士人群体的领袖，由于他时常褒贬时政，因而成了被打击压制的对象，成为当时“反智论”者的牺牲品，故仕途坎坷。他的人生经历虽对其治史产生影响，但他评论史实终究还是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故能在明史研究上作出杰出的成就，成为明代最为重要的史学家。而与之相反的是张居正，初入仕途就为“储相”的庶吉士，后一直任职于翰林院，最终成为强权首辅，而他所走的正是大学士阶层几乎相同的道路。尽管他生前荣耀，死后却相当凄惨，注定也是个悲剧人物。他们二人正是文人与权臣的代表，而他们命运的坎坷也正是嘉、万时期文人与权臣命运的缩影。

Two Types of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16th Century in China: Wang Shizhen the Scholar and Zhang Juzheng the Minister

SUN Weiguo

Abstract: Wang Shizhen and Zhang Juzheng have been regarded as two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Wang Shizhen got involved enthusiastically in literary circles in his early official career and became a leader of literati in his middle age. His critiques of political affairs made him a target of attack and repression and his official career full of frustrations as a victim of the “anti-intellectualism.” Although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did impact his study of history, he had tried his best to b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in his comments on historical events. Maybe that is why he could reach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Ming history studies and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ans in the Ming Dynasty. By contrast, Zhang Juzheng had been a “*Shujishi*,” a new official trained to be a high official in future, in his early official career, then a member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Hanlinyuan*), and finally became an influential minister. His career is typical for intellectual elite. Although he was honorable and glorious in his lifetime, he was doomed to be sad and tragic after death. They both stand for scholars and influential ministers in the reigns of the Emperor Jiaqing and the Emperor Wanli respectively and their fates are those of the two types in miniature.

Keywords: Wang Shizhen, Zhang Juzheng, Literati, Minister, Anti-intellectualism

收稿日期: 2005-08-30

作者简介: 孙卫国(1966-), 湖南衡东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史学史与中朝关系史。

⁹⁰ 具体参见孙卫国:《清修〈明史〉与王世贞》,《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78-88页。